

会计：世俗社会的理性卫道士

杨雄胜 ■

《财务与会计》约我汇报这几年研究了些什么，使我好生为难！已为大家熟知的研究，汇报纯属多余；不为同行关注的研究，汇报更属多余。但是，对《财务与会计》杂志的尊敬之情使我不能失约。现想谈谈我对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近期忧思。

马克斯·韦伯有个著名的观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并成熟于西方，完全赖于西方新教文化被人们普遍接受，这种新教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鼓励人类积累和节俭，即“理性地追求无限利润”，把新教文化带到社会经



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途径就是会计制

度。由此而言，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似乎集中体现在会计制度的落后上。新中国成立时，统一的社会主义会计制度成了其基本保证；而近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寻求富民强国之梦，中国会计的国际化恰恰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可以说，没有坚实的会计制度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市场的运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的廉政自律，都将是一纸空文。我一直试图解答这么个问题：西方的领先、中国的落后以及近三十多年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快速提升，会计制度发挥着何种作用？如何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

行状况，后者反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等上市公司财务运行状况。二是基本财务指数与特定财务行为指数。前者按基本财务指标编制，具有稳定性、普适性的特点；后者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编制，如再融资行为指数、投资行为指数、并购行为指数等，具有动态性、个体性的特点。

三、成果实现

财务指数无疑具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作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作为企业自我评价的参照；不仅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决策的参考，也将成为学术研究的数据来源之一。

这项研究的价值更在于：第一，拓展了财务信息的应用层次，实现了从信息

生成到信息利用的逻辑延展；第二，拓展了财务分析的空间视野，实现了从单个企业财务分析到宏观综合评价的空间跨越；第三，把经济景气程度财务化，彰显了财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实现了从海量数据到指数形态的简约处理，增强了信息的可理解性。

财务指数的研究过程是艰辛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既得益于财政部诸多领导及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凝聚着我们研究团队持久艰苦的努力。因此，在财务指数即将面世之际，写上这篇短文，讲讲这个故事，以表达我对《财务与会计》、对所有关心者和支持者的深深谢意！ ■

责任编辑 鲍双双

作者简介

赵德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获得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全国首批10位“会计名家培养工程人选”，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先后发表论文90余篇，独著或参著出版专著6部，主编、副主编及参编教材20余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及其他省部级教学科研奖6项。



来充分、全面、正确地认识会计的这种作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人类社会对全球化本来充满着善意期待，以为全球化能给较不发达国家带来繁荣富强，使人民因此生活幸福。然而，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较不发达国家在得到极其有限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遭遇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败坏的社会风气及脆弱的经济结构。

我不禁想，会计在其发展进程中，会不会也存在着异化倾向？人类社会需要的会计制度是正义公平的化身。然而，会计在现实中存在、发展，稍有不慎，就会走向正义公平的反面。这不是会计制度的必然，而是会计置于现实环境后，现实环境恶化影响会计的结果。因此，会计研究必须探求会计向善之道，这是一个对既有会计理论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也是我们往往想回避的话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对已有市场经济各种实践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刻反思，出于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永久和平的憧憬，必然需要把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最大善意嵌入到全球化潮流中，会计对此也担负着自己的使命。从本世纪初的“安然事件”，到其后的“雷曼事件”，我们总可以找到千万个理由说这不是会计的问题，

或者说会计不能对此负责。但是凭心而论，这些事件离开了会计，几乎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们没有必要在会计与这些事件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上做文章。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会计于这些事件，尽管不是元凶，但至少是帮凶。会计在现实中可能已背叛了从制度层面对人类社会的那种承诺，应该引起会计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从社会伦理道德和基本法制角度寻求解决之道，否则，终难摆脱异化的厄运。

就现实看，会计的每一种具体制度安排，都为人们提供了善恶的双重可选空间。以企业合并为例，企业合并是经济实现有效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会计对此必须拿出相应的处理方案。股权联营法与购买法正是因此出台的。但认真审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这方面的历史，结合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的乱象，不难发现，会计在现实中不但没有很好地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成了企业无效甚至是恶性合并的帮凶。乔尔·塞里格曼在《华尔街变迁史》中，用几乎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会计界、商界在企业合并会计处理上的各种争执和妥协，以至于严重偏离了企业合并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企业合并会计成为既得利益方谋取最大利益的工具，股权联营法与购买法都沦落为企业实际当前控制方谋取自己

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从而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约翰·布鲁克斯在《沸腾的岁月》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会计是如何明目张胆地帮助企业恶性膨胀的。按会计提供的方法，一家市盈率高的公司收购市盈率低的公司会产生魔术效果，即使企业业务毫无增长，合并后第一年会产生高于公司前一年每股盈余的结果。布鲁克斯认为，“20世纪初，美国会计师还是视自己为推动正确而诚实的商业关系的改革者和福音传播者。”会计师行业“第一次堕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期间，当时许多会计师发现了高估公司的账面资产价值，从而帮助抬高公司股票价格的隐蔽方法。”市场“对企业业绩的简化认识，很快导致会计师包括一些最好的会计师，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他们的公正基础，不时心甘情愿地沦为无情的企业管理者和毫无诚信的股票推销商的帮凶。简而言之，出卖他们的灵魂。”从企业合并会计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会计在现实中确实走在与出发时所设定的目标不一致甚至是相冲突的道路上，会计界若对自己的这种状态麻木不仁，会计实务就真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正因如此，会计界的自我反省能力尤为重要，会计理论必须对会计这种异化现象作出深入研究，最终提出治本之策。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会计行业必须及时觉醒，才能走向光明前景。 ■

责任编辑 刘良伟

作者简介

杨雄胜，南京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会计基本理论、内部控制与财务管理。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十余部，先后十次获中国会计学会年度优秀论文奖。2008年被财政部授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